

能源是福还是祸？

——能源丰裕国经济增长分流的逻辑

宋亦明*

内容摘要 半个世纪以来,能源丰裕国中的加拿大等国实现了长期、持续和稳健的经济增长,而俄罗斯等国则落入了经济增长趋缓、停滞甚至衰退的发展陷阱之中。为了理解能源丰裕国经济增长的这种分流现象,本文建立了以经济现代化起点为自变量、以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为中间变量的分析框架,通过定量分析以及对俄罗斯与加拿大的比较历史分析,可以发现能源丰裕国的经济增长绩效取决于其开启经济现代化起点的早晚而非能源丰裕程度。研究表明,较晚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能源丰裕国以“追赶型”模式发展,其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干预因而催生了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并建立了能源领域的国家产权制度。这使得能源产业有能力且必须贡献超额税汇、提供过度补贴、影响选举结果,进而导致政府与政治家对能源产业形成了病态的依赖。这类国家最终形成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持续深远地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能源诅咒”的政治起源: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与产权制度(项目批准号:2022QD04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一带一路”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政治风险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ZX026)的阶段性成果。宋亦明,政治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能源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李巍、Michael Ross、王正毅、王明进、郑宇、田野、赵晨、黄琪轩、夏敏、陈占明、周强专家学者等对本系列研究的初稿提供了建设性指导;詹晶、张昕、叶成城、陈冲、陈兆源、刘露馨、释启鹏、Jeff Colgan、Ronald Rogowski、Benjamin Smith 等接受了笔者的学术访谈。《比较政治学研究》约请的匿名审稿人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笔者在此一并感谢,然而文责自负。

拖累了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之相反,较早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能源丰裕国以“原生型”模式发展,其政府则并未大规模推动能源产业的发展。这导致其能源产业联盟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相对平衡并且在能源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进而隔绝了相应的病理渠道。最终,这类国家并未形成对能源产业的病态依赖,能源收益则成为其推动经济增长的加持性力量。

关键词 能源诅咒;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联盟;产权制度

一、引言

晚近以来,能源丰裕国之间的经济增长失衡问题逐渐凸显,业已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发展鸿沟。^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三个现象分别在于:其一,世界上39个能源丰裕国中仅有挪威、加拿大等六个国家自1960年到202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净值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② 其二,上述国家中仅有印度尼西亚等五个国家自1970年到202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超过了同期石油价格的增速。其三,39个能源丰裕国中有18个国家属于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天然气输出国论坛成员国。作为严重依赖能源出口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中仅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三个国家的201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明显高于1973年的水平。这三个现象均清楚地表明能源丰裕国的经济绩效存在明显的差异、其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分流。

基于此,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能源是福还是祸?具体而言:为何多数能源禀赋丰裕的国家通过大规模能源出口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此类国家却往往难以据此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与之相对

① Frederick van der Ploeg, Anthony J. Venables,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The Challenge of Managing a Windfall,”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2(4), pp. 316–318.

② 宋亦明、吴泽平:《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现代化基础与产业逻辑》,《欧洲研究》2023年第2期。

的是,为何加拿大、挪威等国家通过大规模能源出口却获得了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能源丰裕国产生了经济增长的分流?这种分流的产生是遵照经济性逻辑还是另有其政治性根源?

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其余部分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回顾既有的“能源诅咒”(Energy Curse)病理学研究,并且说明其在解释能源丰裕国经济增长分流时的适用性困境。第三部分有针对性地建立起以经济现代化起点、产业联盟形态、产权制度选择为主要变量的分析框架。第四部分运用笔者建立的“能源丰裕国主要社会经济数据”数据集进行定量分析。第五部分围绕俄罗斯和加拿大这两个能源丰裕国进行对比分析,详述经济增长分流的原因及相应逻辑。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能源诅咒”的病理学研究及其适用性

如果将能源开发与出口拖累经济增长的现象称为“能源诅咒”,那么“能源诅咒”的病理学则致力于揭示该现象的生成机制。打破不同学科之间及宏观与微观层次上的边界,可以将不同知识范畴内对于“能源诅咒”病理学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两支谱系:其一为聚焦能源开发与出口直接影响经济效率的功能性解释,其二为关注能源开发与出口通过影响国家治理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分配性解释。^①

在功能性解释的视角下“能源诅咒”之所以生成,其可能的解释分别在于以下四点:第一,能源开发与出口产生“荷兰病”效应。一方面,蓬勃发展的能源部门从制造业部门吸取了更多的劳动力,后者为了争夺劳动力不得不为其提供更高的工资,这种变相的成本上涨直接削弱了制造业部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能源出口的巨额收益提高了本国货币的汇率和对商品的购买能力,国内的制造业部门因为汇率的上升失去了出口竞争力。在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大规模

^① Michael L. Ros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source Curse,” *World Politics*, 1999 (51), p. 298.

出口能源的国家走向了一条去工业化的道路。^① 第二,资源价格的反复、剧烈波动既损害投资者进行长期价值投资的信心,也迫使政府接受更高的贴现率。这导致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政府在做出与资源相关的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短平快”的方案,然而这些短期行为要比长期审慎的资源投资更容易失败,长此以往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经济增长。^② 第三,能源产业的发展“挤出”了投资、储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有助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第四,能源出口形成并锁定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发展中国家出口能源而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由此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并且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贸易收益分配低、无法较好地适应贸易周期、主要出口产品弹性较低等一系列问题。^③

在分配性解释的视角下对“能源诅咒”之所以生成可能的解释分别在于:第一,能源开发容易引起寻租和腐败。能源往往是政府干预和管制最集中的产业之一,其开发和出口所涉及的执照办理、特许审批、配额发放等均与政府密切相关,这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寻租和腐败行为。^④ 而寻租和腐败使得能源公司和政府共同选择了次优而非最优的能源生产模式,最终影响经济增长。^⑤ 第二,开发容易引发内战。能源收益极大地激起了地方民众、分裂势力、少数族裔等的贪欲,激励其发动旨在控制能源的武装斗争。^⑥ 对能源公司进行资金劫掠或者自行出售能源以获取收益,这两种方式均为上述群体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① The Economist, “The Dutch Disease,” November, 1977, pp. 82–83; W. Max Corden, J. Peter Neary, “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s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2(92), pp. 825–848.

② 卢凌宇、许剑:《因“祸”得福? 石油进口依赖与发展中国家能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

③ Rau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Lake Success, 1950.

④ Ragnar Torvik, “Natural Resources, Rent Seeking and Welfa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2(67), pp. 455–470; Ivar Kolstad, Arne Wiig, “It’s The Rents, Stupi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source Curse,” *Energy Policy*, 2009(37), p. 5320.

⑤ Farouk Al-Kasim, Tina Søreide, Aled Williams, “Corruption and Reduced Oil Production: An Additional Resource Curse Factor?,” *Energy Policy*, 2013(54), pp. 137–147.

⑥ Paul Collier,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4(56), pp. 563–595.

进而使得其有能力发动内战。^① 内战会抑制生产活动、模糊产权边界、削减劳动力人口,进而拖累了经济增长。^② 第三,能源开发弱化国内制度。能源繁荣所导致政策封闭和分配不公等阻碍了制度改善;能源繁荣导致了更频繁和更暴力的冲突进而破坏了国家的产权制度;非税收的能源意外之财加剧了政治代理问题,并且通过降低政治候选人素质影响了政治制度的运作,最终拖累了经济增长。^③ 第四,能源开发弱化国家的提取能力。能源开发与出口的利润往往十分丰厚,使得政府获得的能源租金极其充盈。由于能源租金基本满足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需求,因而其不必依赖其他产业所缴纳的税收。^④ 这严重弱化了能源出口国的财政提取能力,其税务及其他行政机构无法实现对经济事务的有效管理,最终有损于国家的经济增长。^⑤

虽然上述研究为理解“能源诅咒”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但在将其阐释的病理机制直接用于能源丰裕国经济增长分流时就会出现明显的适应性问题。这种适应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无法解释能源病理效应与挪威、加拿大等国取得较好经济绩效之间的机制断层。上述研究充分阐述了能源在功能层面和分配层面所存在的大量病理效应,但悖论在于这些病理效应只拖累了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增长而没有明显影响挪威、加拿大等国的经济增长。^⑥ 究其根源,“能源诅咒”成因的条件性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探讨。其二,解释的边界无限延展且过分叠加。上述研究大多以国家能力、制度质量、要素投入、

① Michael L. Ross, “How Do Natural Resources Influence Civil War? Evidence from Thirteen Cas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4(58), pp. 42–45, 52–55.

② Roland Hodler,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Fractionalized Countr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6(50), pp. 1367–1386.

③ Fernanda Broilo, Tommaso Nannicini, Roberto Perotti, Guido Tabellini, “The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103), pp. 1759–1796.

④ Terry Lynn Karl, *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st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48–49, 61–62; Thad Dunning, *Crude Democracy: Natural Resource Wealth and Political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7–60.

⑤ 卢凌宇、许剑:《因“祸”得福? 石油进口依赖与发展中国家能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

⑥ 宋亦明、邹仪婷:《委内瑞拉能源经济的增长何以不彰?——基于经济现代化—产业联—产权制度的分析视角》,《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3期。

内战等结构性因素作为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往往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很容易不自觉地夸大这些变量及相应机制的解释边界。这使得解释边界本已无限延展的单个解释相互叠加,而且在逻辑和实证上均难以说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对部分能源丰裕国实现较快经济增长的讨论变成了罗列促进经济增长因素的大杂烩。

三、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与产权制度： 核心变量与分析框架

为了避免上述适应性问题,本文建立的分析框架应该满足以下三个要求:第一,在借鉴上述“能源诅咒”病理学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发掘特定的非能源因素对能源丰裕国经济增长分流的影响机制。第二,在学理上明确相应机制的解释边界,并且让对解释边界的识别在实证上成为可能。第三,不拘泥于对影响能源丰裕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的探索,要尝试继续向前追溯因果链条进而揭示其历史性根源。为此,本文由直接到间接、以反向递推的方式逐步回溯了影响能源丰裕国经济增长分流的结构性变量并阐释了其作用机制。

(一)能源依赖与经济增长分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一个能源丰裕国究竟能否实现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这取决于该国是否形成能源依赖而非其能源是否丰裕。尽管近年来讨论生产及贸易集中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愈发复杂,但鲜有争议的是经济增长绩效较好的国家并不依赖于特定的要素和产品;而经济增长绩效较差的国家在生产和贸易上则具有较高的集中度,往往依赖于特定的要素或产品。^①显然,笼统地以能源为自变量说明不

^① Olivier Cadot, Céline Carrère, Vanessa Strauss - Kahn, "Trade Diversification, Income, and Growth: What Do We Kno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3(27), pp. 790 - 812.

了任何问题,重要的是要区分能源丰裕与能源依赖,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后者而非前者触发了因果机制。^①可以说,能源丰裕并不是一国陷入“能源诅咒”的真正元凶,相反,能源产业畸大才是直接的罪魁祸首。后者通过下述两个渠道直接拖累了一国的经济增长。

一方面,工业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然而能源产业畸大很容易拖累一国后续的工业化进程。能源产业畸大会带来明显的挤出效应,这必然对工业化所依托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能源产业对于人力资本的需求较低,对于能源产业畸大的国家而言其政府对教育的公共投入也明显更低,由此形成了能源产业畸大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恶性循环。^②虽然发展型国家能够相对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能源产业畸大的国家难以孕育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质。^③总之,固然工业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但是能源产业畸大会通过上述渠道拖累一国后续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对于依赖能源的国家而言,其工业化进程往往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停滞不前。^④

另一方面,能源出口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其中能源产业畸大的能源出口国受波动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当能源价格在较长的周期内明显高于合理的价格区间时,“荷兰病”效应将会凸显,能源出口国的制造业在能源价格长期高企时很难取得发展,这间接破坏了经济增长的制造业支柱。当能源价格在较长的周期内明显低于合理的价格区间时,能源出口国会出现本币持续贬值和财政赤字攀升等问题。^⑤当能源价格在较短的周期内反复剧烈异动时,能源出口国无法

① Sven Oskarsson, Eric Ottoson, “Does Oil Still Hinder Democrac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0(46), p. 1069.

② Lara Cockx, Nathalie Francken, “Natural Resources: A Curse on Education Spending?,” *Energy Policy*, 2016(92), pp. 394–408.

③ Pauline Jones Luong, Erika Weinthal, *Oil Is Not a Curs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s in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75.

④ 张复明、景普秋:《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Jeffrey D. Sachs, Andrew M. Warner, “The Big Push, Natural Resource Booms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9(59), pp. 43–76.

⑤ Alexander James, “The Resource Curse: A Statistical Mirag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5(114), pp. 55–63.

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一国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以能源为主的单一出口结构,而出口结构越单一上述三个负面影响就越显著,进而该国就越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总之,能源产业畸大在国内层面拖累后续的工业化进程、在国际层面放大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由此直接拖累了一国的经济增长。反之则反是。

(二)产业联盟、产权制度与能源依赖

至此可以认为一国能源产业畸大与否是导致其经济增长绩效好坏的直接原因。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说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有损于经济增长,那么为何具有能动性的政府不尝试改变产业结构以减轻能源依赖?^①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能源出口国国内产业联盟和产权制度的政治分析。斯蒂芬·哈格德在讨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发展的政治逻辑时就已经提及了决定一国产业政策选择的四个重要因素,即国际系统、国内联盟、政治制度及理念。^②哈格德已经充分意识到,一方面国际系统无法解释相同处境下国家的行为差异,因此有必要考虑国内层次的变量;另一方面国内联盟大致框定了产业政策选择,而这种选择同时还受制于政治制度环境。所以为了阐明能源产业畸大的产生原因就必须打开“国家的黑箱”,分析一国内部的产业联盟形态及产权制度类型。

“产业联盟”是由同属一个产业的从业者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一般来说,缴纳更多税收或租金、从业人数更多、开展集体行动更有效的产业联盟实力更强,其对政府和政治家的影响力更大且关系也更为紧密,政府和政治家也对该产业联盟更为倚重甚至更为依赖。基于此,本文将重点考察产业联盟的形态,即能源产业联盟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府和政治家对能源产业联盟的依赖程

① Antonio Cabrales, Esther Hauk, “The Qualit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1(121), p. 60.

② [美]斯蒂芬·哈格德:《走出边缘——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长的政治》,陈慧荣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3页。

度,据此进一步发掘“能源诅咒”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

当能源产业联盟较其他产业联盟实力更强时将带来三个政治效应。首先,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诱发了“税汇陷入”效应,即政府形成了对能源产业联盟的税收和创汇依赖,失去了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动力。^① 其次,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导致了“补贴分异”效应,即政府形成了对能源产业联盟的再分配依赖,然而能源产业联盟提供的再分配性补贴不仅失衡,还弱化了政府通过再分配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能力。^② 最后,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加深了其与政治家之间的“利益交换”效应,即面临选举压力的政治家有赖于能源产业联盟的支持,并且在胜选后往往以大力支持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回报。^③ 此举进一步扩大了能源产业在国家产业布局中的优势地位。在如此往复的循环中,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得以巩固并不断自我强化。

“产权制度”是指限定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让渡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安排。与此一一对应的是,根据一国政府对其在其国内一家或多家主要能源企业的持股比重;能否调动能源企业以实现与后者无关的非经营目标;能否从能源企业获得除税收和股权收益外的其他收益;能源企业的股权能否在资本市场上自由转让的制度设计或实践,本文可以将不同国家在能源领域实施的产权制度分为国家产权制度与私人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类型的差异对国家后续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④ 对于能源出口国而言,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最终是否会形成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

①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255页。

② Andrew Cheon, Maureen Lackner, Johannes Urpelainen, “Instruments of Political Control: National Oil Companies, Oil Prices, and Petroleum Subsid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4(48), pp. 397 - 399; Terry Lynn Karl, *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 - St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16.

③ Paul Collier, *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4 - 49.

④ [美]B. 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1页。

国家产权制度使得政府与能源产业联盟的边界变得模糊,这使得“税汇陷入”“补贴分异”“利益交换”这三个政治效应更容易出现。在能源领域的国家产权制度下,政府很容易突破其与能源产业联盟的权利与责任边界,并将自身偏好施加于本国能源产业联盟之上。^①这导致能源产业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经营与发展策略选择的自主性,需要遵从政府的特定要求并成为后者意志的延伸;相反,政府则高度依赖能源产业联盟甚至在推行政策时将其“内部化”。由此触发了上述三个政治效应,即在能源领域的国家产权制度下,能源产业联盟需要根据政府的要求贡献超额税汇,这必然产生了“税汇陷入”效应;能源产业联盟需要根据政府的要求向其他产业联盟提供大规模补贴,这必然产生了“补贴分异”效应;在任的政治家能够轻易地裹挟着能源产业联盟为其连选连任提供支持,这很可能会强化“利益交换”效应。

总之,当一国国内的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强于其他产业联盟、并且该国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时,其能源产业有能力且必须贡献超额税汇、提供过度补贴、影响选举结果。这使得政府与政治家对能源产业形成了病态的依赖,不可避免地塑造强化了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反之亦然。

(三)经济现代化与产业联盟、产权制度

对于制度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其本身,还要向前追溯制度的起源。^②可以说,一国产权制度的选择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其产业联盟的形态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历史遗产。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由此产生: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与能源领域的国家产权制度何以出现?两者为何必然成对出现?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能源出口国迈入经济现

① Peter Hartley, Kenneth B. Medlock, “A Model of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Oil Company,” *Energy Economics*, 2008(30), pp. 2459–2484.

② [美]贾雷德·戴蒙德:《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比较人类社会》,栾奇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6、61、74页;[美]戴维·瓦尔德纳:《国家建构与后发展》,刘娟凤、包刚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2页。

代化进程的起点加以分析。“经济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以大工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生产模式及以高度整合、等级与秩序为特征的社会经济组织模式,而“经济现代化”则是以“经济现代性”为目标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进而国家迈入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可被简称为“经济现代化起点”。从根本上讲,不同国家经济现代化起点的不同导致了其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的分异。

就产业联盟形态而言,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国家的政府往往会大规模干预经济,优先发展以能源为代表的产业,这很容易导致其能源产业联盟在该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之初就拥有了远强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在英国等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早的国家中,各个产业通过技术革新与贸易盈利自主发展,政府并未通过直接的行政干预或积极的产业政策介入经济活动或优先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这种“原生型”的自主发展模式使得这类国家内各个产业的发展相对均衡,因此产业联盟间的实力对比也更为平衡。在俄国等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国家中,政府高度介入经济发展并通过提供补贴、承诺收益、政府采购、行政干预等方式刺激能源、钢铁和军工等重要产业的发展。这种“追赶型”的干预发展模式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动了少数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明显加强了这些产业联盟相较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优势。^① 能源产业具有重要的商业和战略价值,因而得到了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国家其政府的优先发展和强力扶持。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国家在其追赶初期片面发展能源产业的政策直接导致了能源产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远超上述其他产业,进而使得能源产业联盟的实力也远强于其他产业联盟。

就产权制度类型而言,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国家的政府往往会在能源领域建立起国家产权制度。其原因分别在于:其一,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国家对整合社会力量以实现经济增长的需要更迫切,因而会建

^①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9—63页。

立起动员体系,而动员体系很容易孕育出国家产权制度。^①其二,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国家的政府为了尽快扩大税收并获取外汇,往往会采取通过建立国家产权制度来控制能源产业的机会主义行为。^②其三,能源产业的高资本密度与高垄断性特性,意味着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国家内部只有政府有能力推动能源开发和出口,相应地,政府在能源领域建立起国家产权制度也就理所应当。^③其四,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国家的政府很容易接受能源国有化的规范,其在实施能源国有化后会建立国家产权制度。^④

综合上述对于因果机制的阐述,可以清晰地发现:经济现代化起点早晚从根本上框定了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的差异决定了能源产业是否畸大;能源产业是否畸大则直接影响了能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绩效(见图1)。

四、定量回归分析

本文分别在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运用定量回归分析和比较历史分析进行“一致性平行实证检验”。该检验要求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分别开展互不影响的研究,即分别搜集数据、资料并分别先后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进而实现研究结论的互证和对因果机制的多重稳健性检验。^⑤

基于第三部分对于能源丰裕国经济增长分流的分析框架的讨论,在其他条件不变或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
- ① [美]戴维·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29页。
 - ② Paasha Mahdavi, “Why Do Leaders Nationalize the Oil Industry? The Politics of Resource Expropriation,” *Energy Policy*, 2014(75), pp. 228–243.
 - ③ Terry Lynn Karl, *The Paradox of Plenty: Oil Booms and Petro-st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44–69.
 - ④ David Victor, David Hults, Mark Thurber,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Oil and Governanc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World Energy Supply*, edited by David Victor, David Hults, Mark Thurb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8–9.
 - ⑤ Evan S. Lieberman, “Nested Analysis as a Mixed-Method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5(99), pp. 435–452.

假说 1a:一国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起点越晚,越可能出现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

假说 1b:一国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起点越晚,越可能在能源领域建立国家产权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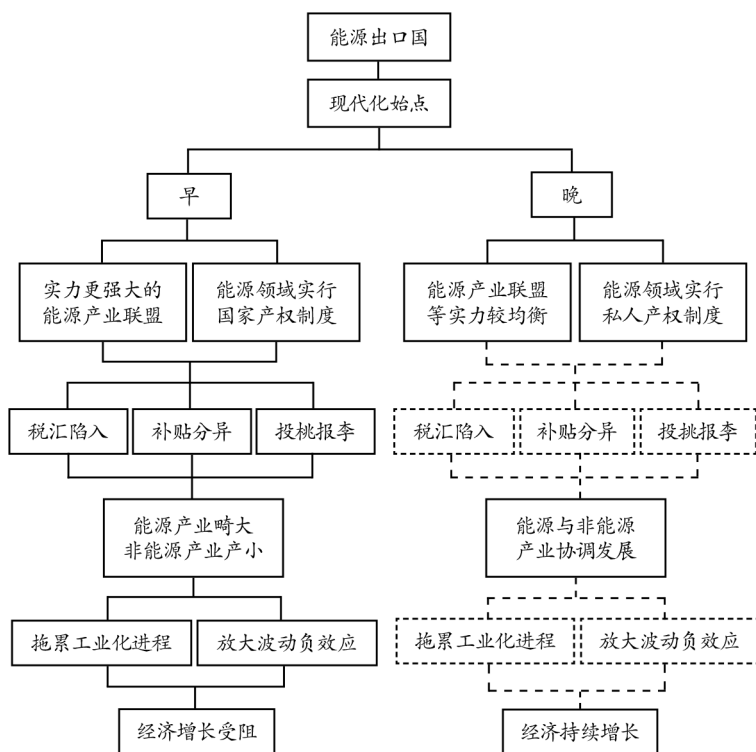


图1 因果机制示意简图

注:虚线表示未触发的机制。

假说 2a:一国能源产业联盟实力越强,其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较高比例的可能性越大。

假说 2b:一国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其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较高比例的可能性越大。

假说 3a:一国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越高,其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

假说 3b:一国能源禀赋的丰裕程度不会显著影响其经济增长速度。

假说 4:一国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起点越晚,其经济增长速度就越慢。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笔者构建了“能源丰裕国主要社会经济数据”数据集,对既有的“能源诅咒”病理学研究所提及的变量以及上文分析框架中所涉核心变量进行测量。^① 基于这一原创数据集,根据回归分析的基本要求和一般操作,第四部分的论证分为三个步骤:其一,初步呈现核心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详述所选用的两种回归方法及其原因,并且汇报回归结果。其三,通过运用替代性测量方式及更换回归模型的策略进行四项稳健性检验,并且简要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图 2 至图 5 分别呈现了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初步检视了本部分之初所列的 7 个假说。首先,如图 2 所示,后发国家能源产业联盟实力和能源领域实行的产权制度在各自箱线图的中位值均高于先发国家对应变量的上限值。这很可能意味着对于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后发国家而言,其能源产业联盟实力更强、在能源领域的产权制度类型也更偏向国家产权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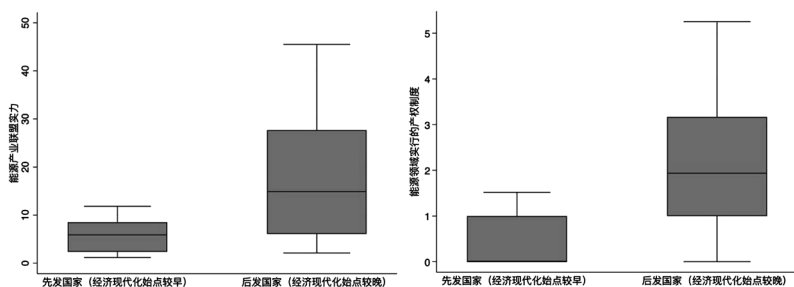


图 2 经济现代化起点分别与产业联盟形态及产权制度类型的关系

① 宋亦明等:《能源丰裕国主要社会经济数据》, <https://sym915.github.io/data/>。

其次,如图3所示,能源产业联盟实力与能源领域实行的产权制度分别与能源产业畸大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两组拟合线的斜率均为正。这很可能意味着对于能源产业联盟实力更强和在能源领域更偏向国家产权制度的国家而言,其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更高、其对能源产业的依赖也更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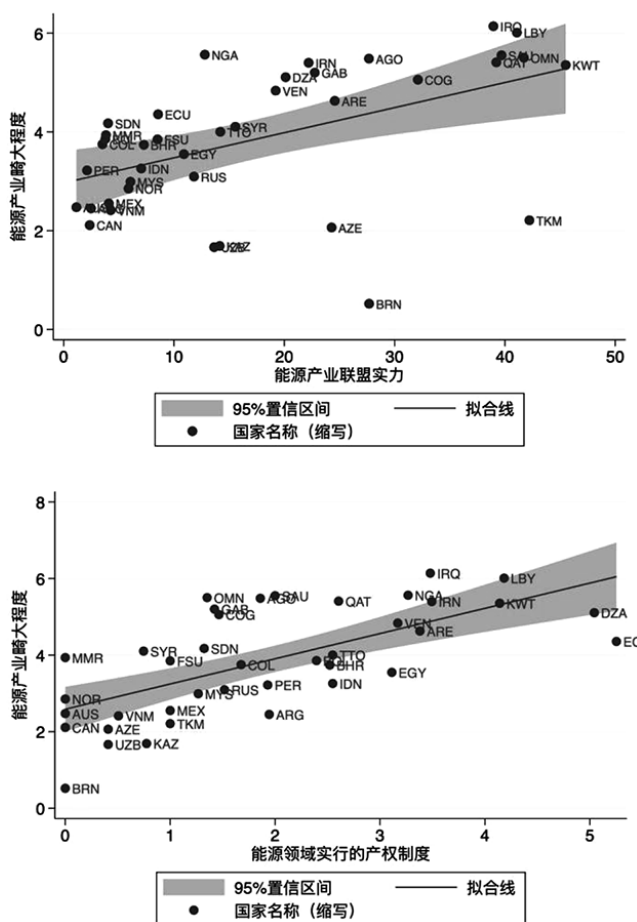


图3 产业联盟形态及产权制度类型分别与能源产业畸大程度的关系

再次,如图4所示,能源产业畸大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其拟合线的斜率为负;并且后发国家在箱线图上的各分界值

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这很可能意味着对于能源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更高的国家以及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的后发国家而言,其经济增长速度更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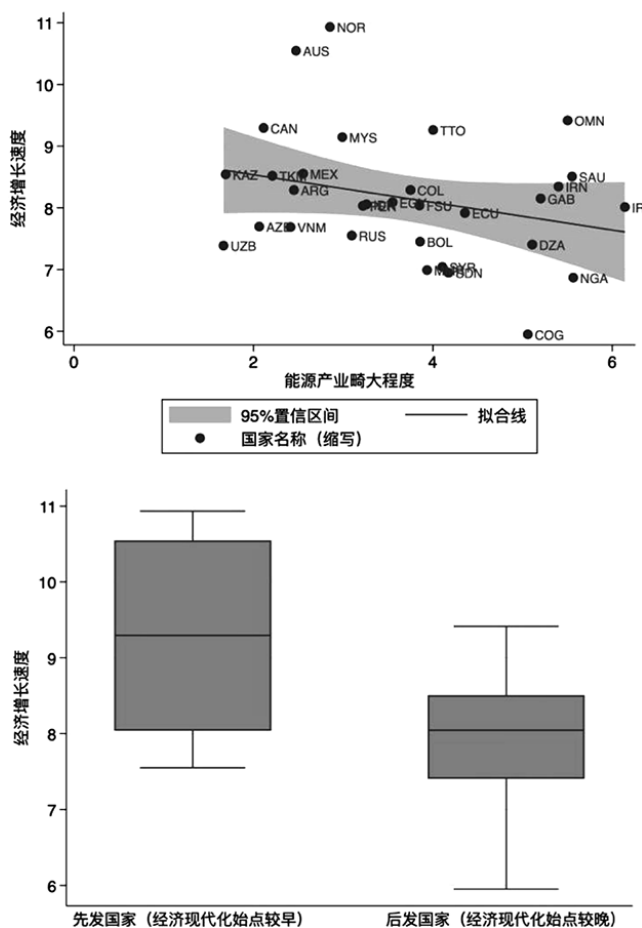


图 4 能源产业畸大程度及经济现代化起点分别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

最后,如图 5 所示,石油丰裕程度与天然气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并未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两组拟合线的斜率接近 0。这很可能意味着石油丰裕程度与天然气丰裕程度不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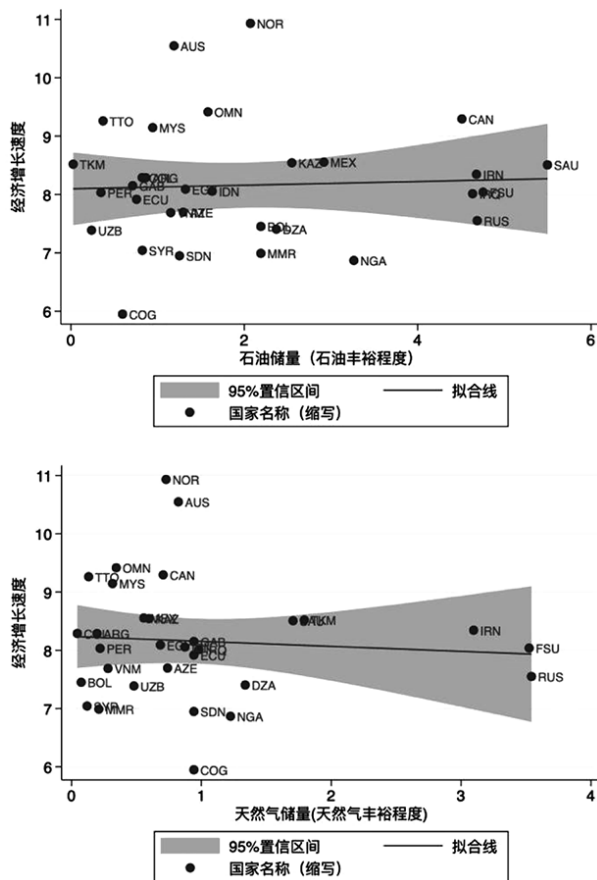


图5 石油和天然气丰裕度分别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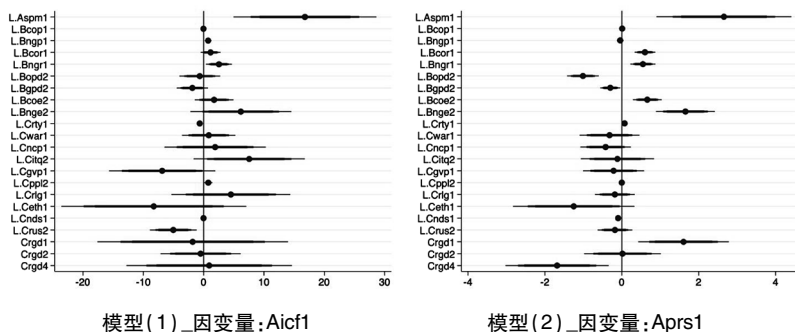
(二)回归设计及结果

本节主要采用如下两种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其一,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后简称OLS)进行回归。其二,基于配套数据集的长面板数据结构进行混合效应(Mixed Effect,后简称ME)、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后简称FE)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后简称RE)分析。^①

^① 邵帅、杨莉莉:《自然资源丰裕、资源产业依赖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10年第9期。

OLS 的回归结果可直观地见于图 6。需要说明的是,在获得 OLS 回归结果的同时,本文通过 BP 检验和怀特检验检视了异方差问题;通过残差图检视了自相关问题;通过方差膨胀因子检视了多重共线性问题。检视后发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明显,但是异方差问题和自相关问题却较为明显,对此应使用稳健标准的 OLS。另需说明的是,为了缓和对逆向因果关系的担忧,本文的全部回归均将核心变量及控制变量时滞 1 年。

ME、RE 和 FE 回归的结果可直观地见于图 7。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由于使用 $A - spm - 1$ 不随时间变化,将其作为经济现代化起点的测量进行固定 FE 分析时会被略去,故而仅汇报 ME 和 RE 的结果。LM 检测强烈接受“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故而应选择并汇报 ME 的结果,详见图 7 中的模型(1)至模型(6)。另一方面,使用 $A - spm - 6$ 代替 $A - spm - 1$ 来测量经济现代化起点虽然理论意义有所弱化但其统计意义则明显增强,进而规避了上述问题并提供了 FE 分析的结果。^① 基于 ME、RE 和 FE 分析对假说 4 的额外检验详见模型(13)至模型(16)。LM 检测和豪斯曼检验均表明应选择 FE 的结果。



① 使用国民预期寿命作为变量的研究,例如:Jean - Philippe Stijns,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34, No. 6, 2006, pp. 1060 - 1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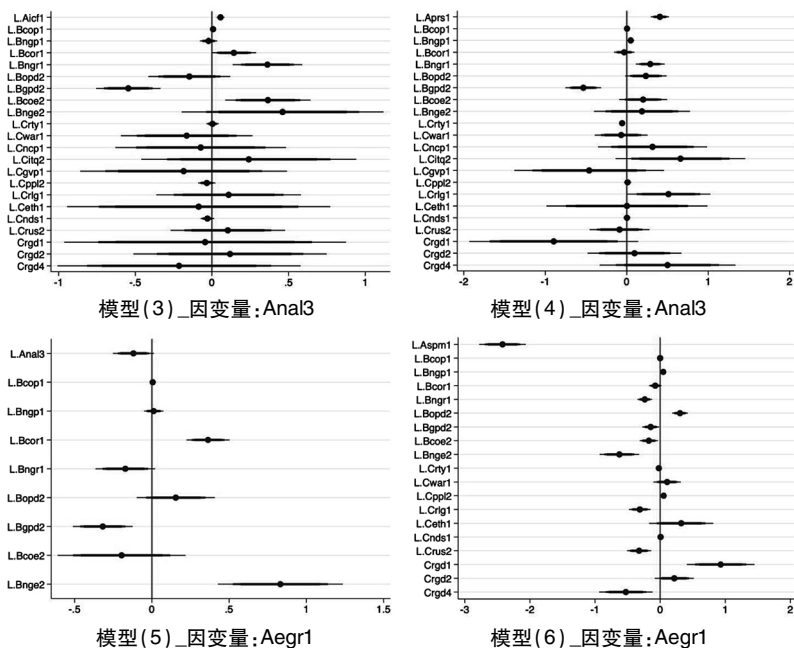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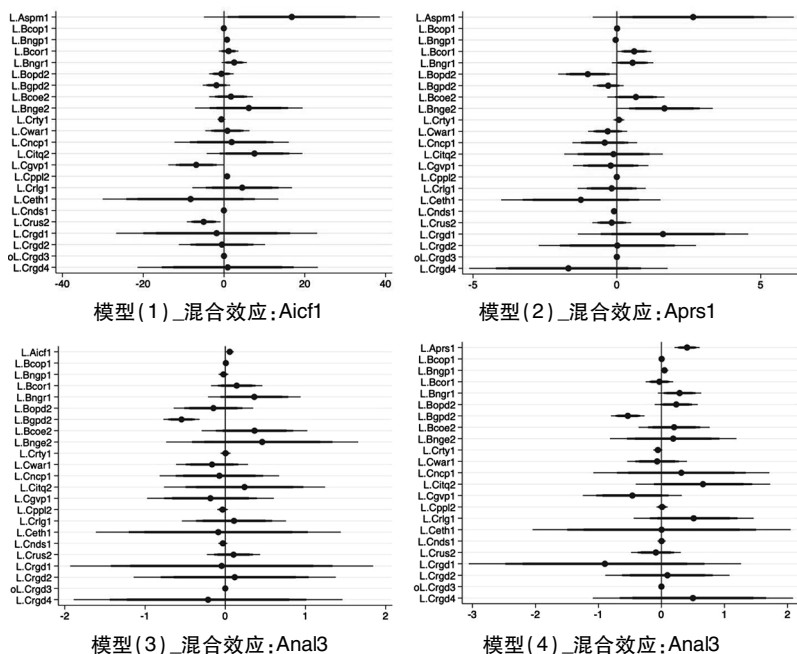


图 6 基于面板数据的稳健标准误 OLS 模型

注:较细、中等和较粗的线段分别代表 90%、95% 和 99% 的置信区间。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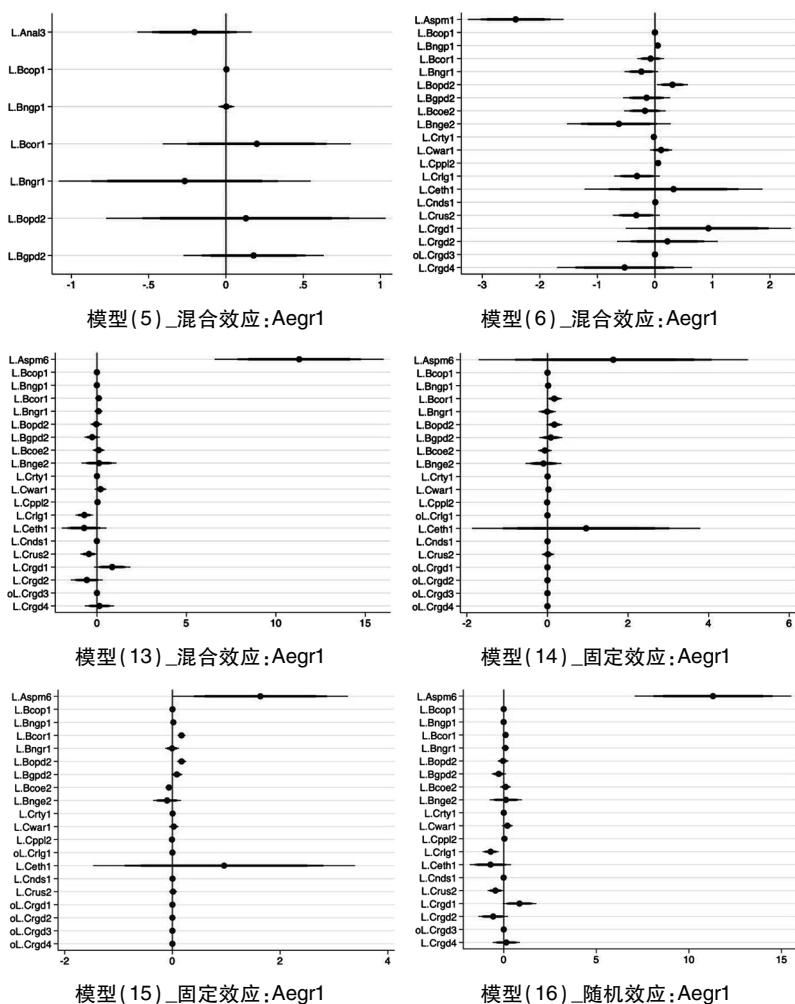


图 7 ME、RE 和 FE 模型

注:模型(14)由细到粗的线段分别代表 80%、90%、95% 和 99% 的置信区间。其他模型置信区间的设定未做调整。

(三) 稳健性检验

参照稳健性检验的基本要求,本节开展了四项稳健性检验。^① 第

① [英]埃里克·诺伊迈耶、[奥]托马斯·普吕佩尔:《定量研究中的稳健性检验》,韩永辉、谭锐译,格致出版社,2020 年。

一,使用截面数据进行 OLS 分析。使用截面数据替代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非数据形态的退化,而是充分考虑了本文自变量经济现代化始点不随时间变化的客观事实。第二,使用哑变量进行逻辑回归。本文的配套数据集提供了全部核心变量的哑变量测量,这为各种二值选择模型的运用提供了可能。第三,使用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后简称 GMM)进行工具变量分析。考虑到扰动项可能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GMM 在此情形下比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要更为有效。探讨“能源诅咒”成因的研究也大量使用 GMM 进行实证分析。^①第四,加入能源产业联盟实力与能源领域产权制度类型的交互项,检视两者之一对能源产业畸大程度的边际效应受到另一变量的影响情况。对调节效应的分析表明,两者相互强化了彼此对能源产业畸大程度的影响,这对于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本部分的分析结果逐一验证了上述七个假说,再三检验了上文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五、比较历史分析:俄罗斯与加拿大的 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分流

在对“横跨因变量的全域案例”逐一检视并进行定量研究之后再行案例筛选和定性分析,这能够避免根据因变量选择案例所带来的偏差。^②得益于这一任务已在第四部分完成,本文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案例选择存有偏差”的问题。即便如此,仍有两个极其重要问题有待说明:其一,如何确定比较的对象,即用于比较的国家及时段?本文同时选用了詹森·西赖特所述的“最大相似”和“典型”这两种策略。^③而通过上文对经验现象和数据的检视,可以发现俄罗斯和加拿大为经济增

① Jeroen Klomp, Jakob de Haan, “Election Cycles in Natural Resource Rents: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121), pp. 83–91.

② [美]芭芭拉·格迪斯:《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陈子恪、刘骥等译,张睿壮、刘骥校,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85页。

③ [美]詹森·西赖特:《多元方法社会科学:定性和定量工具的结合》,王彦蓉、余利青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第1–3页。

长绩效较差与较好的典型能源丰裕国。其二,俄罗斯和加拿大是否具有可比性?将上述 2 个国家进行比较仍满足了 4 个可比性原则:首先作为“民族国家”而具有的同质性构成了可比性的最宽泛基础;其次分别在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等主要指标上具有相近性;再者具有“能源禀赋丰裕”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最后所具有的带有明显差异但无足轻重的变量完全可以被忽略。^① 综上,将俄罗斯和加拿大用于比较历史分析仍然是可行的。

(一) 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能源开发与经济停滞

尽管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起点早于亚非拉国家,但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仍属于后发国家。Б. Н. 米罗诺夫(Boris Nikolaevich Mironov)认为只有在 1861 年的改革后俄国居民生活水平才实现突破性提高,因而这一时点可被视为经济现代化进程开始的标志。^② 基于生产方式、人口变化、经济增长等表现对俄罗斯经济现代化起点的判断结果与上述研究基本一致。因而可以断定俄罗斯大约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启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属于第二波现代化国家。

由于较晚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俄罗斯缺少大规模发展油气产业所需的私人商业资本,由此政府主导资本筹集和投入势在必行。根据拜罗克的计算,俄罗斯的资本丰裕程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排名末尾。^③ 私人商业资本的极度匮乏成了俄罗斯发展资本密集型油气产业的严重掣肘。对此,1872 年后俄国政府一直通过税收政策等来干预石油产业

① 李路曲:《国家间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分析》,《政治学研究》2020 年第 5 期;[法]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文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99—115 页;David Collier, James Mahon, “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 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3(87), pp. 846—848; 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1(65), pp. 686—689.

② [俄]Б. Н. 米罗诺夫:《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 年)》,张广翔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573 页。

③ 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82(11), pp. 281, 330.

的发展。20 世纪初,俄国政府开始直接控制石油产业,并于 1915 年成立了特别燃料会议等机构来统筹石油生产。

自此俄罗斯走向政府大规模干预油气产业发展的道路。而政府的大规模干预又进一步导致俄罗斯形成强大的油气产业联盟并在油气领域建立起了国家产权制度。就产业联盟形态而言,俄罗斯油气产业联盟经过长期发展最终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实体。^①就产权制度类型而言,苏联及之后的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油气领域建立了国家产权制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产权制度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制度安排及具体操作混乱不清。^②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在油气领域重新确立了国家产权制度。

强大的油气产业联盟和国家产权制度相结合,使俄罗斯在税汇收入、产业补贴、政治竞争这三个方面对油气产业形成了病态依赖。首先,俄罗斯历届政府始终在外汇或税收上严重依赖油气产业,触发了“税汇陷入”效应。^③在俄罗斯联邦时期,油气收入对于其财政收入的贡献越来越重要,2003—2005 年油气产业占税收比重从 25% 上升到 35% 以上。^④其次,俄罗斯通过价格机制使油气产业联盟直接承担了再分配职能,诱发了“补贴分异”效应。2003 年俄罗斯石油国内价格大约为出口价格的 37.4%,天然气的这一数字更是仅为 3.9%。^⑤油气产业联盟以自身的一定损失为代价对其他部分产业联盟进行了补贴。最后,俄罗斯联邦时期都出现了明显的“利益交换”的行为。以普京执政时期为例,他一方面通过以石油收入为基础的公共支出来赢得声誉;另

① Matthew J. Sager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Crude Oil Production in 2000,”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1 (42), pp. 155-158.

② 戴维·霍夫曼:《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冯乃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年,第 186 页。

③ Stephen Kotkin,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

④ 殷红:《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的建立及意义》,《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 年第 3 期。

⑤ 宋景义:《转轨时期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及其对外经济联系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年,第 82 页。

一方面,通过与国有油气公司领导者的紧密关系巩固政治联盟。^①显然,政府或给予国家油气公司在管道运输、项目企业收购等方面的优先权利,或支持亲政府油气公司的发展。相反油气产业联盟则动用其自身资源对政治家竞选活动提供大力支持。^②

俄罗斯政府与政治家对油气产业联盟在税汇收入、产业补贴和政治选举这 3 个方面对油气产业联盟形成了病态依赖,最终导致了该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逐渐形成了油气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1961 至 1990 年苏联政府向油气工业的国民经济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从 6.2% 上升到 13.1%,占工业总投资比重从 15.1% 上升到 31.2%。20 世纪 90 年代后,油气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明显大幅上升,1999 年后基本保持在 15% 以上,2005 年达最高值约为 23.6%。可以说,俄罗斯对油气产业的依赖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严重得多。^③

以油气为核心的畸形产业结构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结果:其一,俄罗斯后续的工业化和产业升级进程全面受阻。作为技术变革速度的表现,苏联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 1971 年的 1.3% 下降至 1984 年的 -1.4%。^④俄罗斯联邦时期,根据相对比较优势指数衡量,俄罗斯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在电子、信息等领域的高技术产品竞争力近乎最低。其二,畸大的油气产业结构巩固了俄罗斯以油气为主的出口结构,这使其经济对油气价格变动过于敏感,放大了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⑤

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严重滞后,加之饱受油气价格波动的负面冲击,不论是苏联还是之后的俄罗斯联邦都难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

① Egil Matsen, Gisle J. Natvik, Ragnar Torvik "Petro Populis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118), p. 2.

② Peter Rutland, "Petronation? Oil, Ga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2015(31), p. 75.

③ Valeriy V. Mironov, Anna V. Petronevich, "Discovering the Signs of Dutch Disease in Russia," *Resources Policy*, 2015(46), p. 97.

④ Istvan Dobozi, "Impact of Market Reforms on USSR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Policy*, 1991(19), p. 308.

⑤ 侯敏跃、李沛:《资源经济和“资源诅咒”关系初探——基于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3 年第 11 期。

长。苏联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其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放缓。多项数据均表明该时期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速度较快,甚至到 1985 年时该指标已经接近零增长。2020 年俄罗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1786 美元,与苏联 1989 年 9883 美元的水平相比并无明显的增长。^①可以说俄罗斯近数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彻底陷入了“能源诅咒”中。

(二)加拿大的经济现代化、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

加拿大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发轫于 19 世纪 40 年代,属于先发国家。加拿大联邦政府发布的关于“工业化摇篮”的历时性介绍指出,该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正是发轫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蒙特利尔。^②在参考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加拿大在产业结构、经济增速和人口变化上的数据,推断出加拿大开启经济现代化的起点约为 19 世纪 40 年代。^③因此,加拿大属于第二波现代化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显然属于较早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先发国家。

由于加拿大较早地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因而其资本要素较为丰裕,有利于私人商业团体筹集足够的资本来进行石油开发。加拿大的木材、金属等工业发展基础良好,为油气开发积累了相对充分的剩余资本。^④拜罗克的人均工业化指数显示,加拿大 1913 年的指数为 46。这一数字不仅高于丹麦、荷兰、意大利和西班牙,更是远高于俄国和日本。^⑤这充分说明在 20 世纪初加拿大已经具有较为丰裕的私人资本。当时加拿大不仅资本相对丰裕而且金融体系也已经较为完善。丰裕的

①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onstant 2015 US\$) –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locations=RU>.

② Government of Canada, “The Cradle of Industrialization,” <https://www.pc.gc.ca/en/lhn-nhs/qc/canallachine/culture/histoire-history/industrialisation>.

③ 李节传:《加拿大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年,第 230—233 页。

④ H. C. Pentland, “The Role of Capital in Canad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Before 1875,”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50(16), p. 459.

⑤ 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982(11), pp. 281, 330.

国内私人资本为加拿大油气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融资,这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加拿大政府全面干预和大力推动其油气产业的必要性。

加拿大政府对其油气产业相对放任的支持和较为宽松的监管直接影响到了其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就产业联盟形态而言,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的实力与其他产业联盟较为均衡。2001—2020 年间,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人数由 13.9 万增长至 18.6 万,显然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始终保持了较小的规模。就产权制度类型而言,加拿大在油气领域形成了私人产权制度,政府很难突破产权制度的边界对油气产业进行过度干预。

自进入油气大规模开发阶段以来,加拿大形成了与其他产业联盟实力相对均衡的油气产业联盟,并且在油气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这使得加拿大政府和政治家并未在税汇收入、产业补贴、政治竞争这三方面对石油产业形成病态依赖。首先,加拿大政府并未在税收和外汇收入上严重依赖石油产业,没有触发“税汇陷入”效应。对于油气产业而言,其纳税额是参照与其他产业相同的会计准则一同计算出来的,并且加拿大政府并没有为油气产业设置特有的税收制度。^① 其次,加拿大政府并未片面倚重油气产业联盟承担再分配职能,而是分别通过建立油气基金和财政均衡化制度来促进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因而没有触发“补贴分异”效应。^② 加拿大政府根据《艾伯塔省遗产储蓄信托基金法》于 1976 建立了艾伯塔省遗产储蓄信托基金,并且在该基金加持下为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和产业联盟平衡推行了多项举措。最后,私人产权制度下加拿大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加之油气产业联盟规模有限,这很难产生政治干预和寻租腐败行为,由此并未触发“利益交换”效应。

与其他产业联盟实力相对均衡的油气产业联盟以及油气领域的私人产权制度均使加拿大成功避免了“税汇陷入”“补贴分异”和“利益交

① CAPP, “Canadian Tax Measures: Fair Treatment for All Industries,” <https://www.capp.ca/explore/subsidies/>.

② Gawdat Bhagat, “Sovereign Wealth Funds: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8(84), p. 1190.

换”效应的生成,实现了油气产业与非油气产业的协调发展。2011—2021年间,油气产业在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基本上稳定在1%至6%的区间内并且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特别是与俄罗斯等油气出口国相比,加拿大的油气产业联盟创造的产值占比要明显低得多,并未出现油气产业一家独大挤占其他产业发展空间的情况。

得益于加拿大并未出现油气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并且加拿大政府并未形成对油气产业的病态依赖,这使该国实现长期稳健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一方面,近数十年来加拿大从未出现工业化进程受阻的情况。^①其二,得益于产业布局均衡,加拿大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石油价格波动对其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即便面临着2008年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加拿大在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着基本稳定的态势。

在油气产业蓬勃发展的加持下,加拿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迅猛。1997—2019年间,加拿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1万美元增长至4.5万美元,累计涨幅达44.2%。此外,2000年来加拿大的人均国民收入整体也呈上升趋势,其年增长率多处于5%至15%的区间内。^②可以发现,加拿大依托油气大规模开发和出口实现了长期、持续和稳健的经济增长。

六、结语

能源丰裕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并非取决于其大规模开发和出口能源所引发的经济效应,而受制于其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早晚而带来的相应政治效应。具体而言,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往往采取政府直接强力干预经济的“追赶型”发展模式,该模式有助于在短期内

①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Canada—Country Commercial Guide,” <https://www.trade.gov/country-commercial-guides/canad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ict>.

②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催生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并建立能源领域的国家产权制度。

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以及在能源领域实行国家产权制度使得能源产业,有能力且必须贡献超额税汇、提供过度补贴、影响选举结果,进而导致政府与政治家对能源产业形成了病态依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最终形成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会在国内层面拖累后续的工业化进程、在国际层面放大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工业化进程受阻加之能源出口的负面影响持续、深远地拖累了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之相反,经济现代化起点较早的能源出口国往往采取“原生型”模式自主发展,其政府也对能源产业的推动与干预较为有限。这使得其能源产业联盟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相对平衡并且在能源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进而隔绝了贡献超额税汇、提供过度补贴、影响选举结果的病理渠道。最终这类能源丰裕国并未形成对能源产业的病态依赖,一方面能够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能够有效缓解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在这一过程中,能源收益成为其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加持性力量。

相较于既有的“能源诅咒”病理学研究,本文首次以经济现代化起点为核心自变量来解释能源丰裕国经济增长分流的政治逻辑。据此重新审视能源丰裕国国家间增长失衡的现象时,不难发现这类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往往早在其迈入经济现代化进程时就已经注定。换言之,能源丰裕国能否实现长期、持续和稳健的经济增长就是其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早或晚的历史宿命。总之,“能源是福还是祸”与能源本身无关,而取决于经济现代化的起点。